

公司董事合规义务的制度建构

陈洪磊*

内容提要：公司合规是一种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其以董事合规义务的形塑为内生力量。在规范层面，董事合规义务的明确表述虽然并未被提出，但是围绕董事合规职责的规范构建已初具体系，并呈现出内容分歧、无处安放、无可追责的治理困境；在实践层面，董事合规义务已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生根发芽，其与忠实和勤勉义务相联，但更多体现为董事自身的守法义务。理论观点的分歧、立法实践的模糊以及司法续造的不足，影响了合规制度从政策推动到自律建构的转型。问题的解决应当立足既有的董事义务二分体系：合规义务由守法义务与监督义务组成，前者隶属忠实义务，后者属于勤勉义务的一环，并分别适用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面对提升守法合规定位的强烈实践需求，董事合规义务应当从部门规章的隐形表达上升为《公司法》的明确列示。

关键词：公司合规 董事义务 监督义务 守法义务

一、问题的提出

这是一个合规（compliance）的时代，也是一个不合规就要被淘汰的时代。从瑞幸咖啡、康美药业到高通、中国知网，从财务造假、垄断到不正当竞争与贿赂，违法违规人员从董事到高管再到普通职工，不合规经营给公司带来的不仅是高额的罚金，更有可能是轰然倒塌的不复深渊。在公司治理领域，剧烈的不合规风险的冲击促使一场静悄悄的治理革命正在发生。“公司治理的大部分职责——监督和控制公司内部事务——已经被合规性所取代。”^{〔1〕} 合规，简而言之，符合规定；具而言之，公司在运营过程中要遵守法律法规、商业行为守则和企业伦理规范以及自身所

* 陈洪磊，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授权资本制法律改革研究”（21AFX018）的阶段性成果。

〔1〕 Sean J. Griffith,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an Era of Compliance*, 57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2075, 2077 (2016). 中译文可见《合规时代的公司治理》，薛前强等译，载《中财法律评论》第14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第225-290页。

制定的规章制度。^{〔2〕}

作为一种被动回应而非内生自治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合规的建立需要从公司层面落实到具体的人。董事会是公司权力的中控系统与中心结点，由其成员承担公司合规义务，既是理论推演的结果，也是立法者的选择。^{〔3〕}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下，董事合规义务既是一位“旧人”，^{〔4〕}也是一个“新贵”，存在诸多的理论困境：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的性质为何？其能否纳入董事勤勉义务^{〔5〕}和忠实义务的框架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违反合规义务的审查标准和责任追究。对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合规义务应当作为信义义务的重要内容，与勤勉和忠实义务并列；^{〔6〕}但有学者表示反对并认为，合规义务在履行逻辑上难以与信义义务兼容，应当确立其独立性；^{〔7〕}还有学者认为，合规义务是勤勉义务的类型之一。^{〔8〕}另一方面，合规义务作为一般性概念，其内涵为何？又可细化出哪些行为准则？对此，有学者认为，合规应当是董事监督义务的一环；^{〔9〕}有学者认为，合规义务包括不得故意或有意识地使公司违法的消极义务和建立有效合规管理体系并监督其执行的积极义务。^{〔10〕}那么，监督义务、合规义务以及守法义务的关系究竟如何？此外，董事合规义务又该如何嵌入既有的公司治理？

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寻找本土治理经验，归纳我国董事合规义务呈现的独有特征与制度供给的不足；其次，观察各国董事合规义务立法及司法的演进轨迹，凝练治理共识；最后，回归中国语境，就董事合规义务的性质、判断标准与入法路径提供一种可行方案。

二、董事合规义务的本土特色与困境

作为舶来品的公司合规，已然在我国语境中扎根发芽。2005年证监会《关于推动证券公司自查整改、合规经营和创新发展的通知》（证监机构字〔2005〕37号）的颁行，拉开了中国法探索合规制度的序幕。十几年间，该制度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同样有所发展，董事合规义务充满了本土化的公司治理特色，但也面临规范供给局促的困境。

（一）规范层面：我国董事合规义务的治理困局

其一，董事合规义务的规定呈现公司法与监管规章的密度倒置。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部门规章与行业规定，均未出现“合规义务”的明确文本表达，但后者对董事会合规职能作出了系统、详尽的规范，密布于证监会、银保监会、国资委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业协

〔2〕 参见陈瑞华：《企业合规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3〕 参见《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66号）第7条、《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2号）第8条等。

〔4〕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5条明确要求，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公司法》第22条也将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董事会决议归于无效。

〔5〕 我国公司法中的“勤勉义务”，在其他国家公司法中常被称为“注意义务”，本文对此不作区分，且为行文方便，在论及具体语境时，可能会交错使用两种表述。

〔6〕 参见赵万一：《合规制度的公司法设计及其实现路径》，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2期。

〔7〕 参见汪青松、宋朗：《合规义务进入董事义务体系的公司法路径》，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4期。

〔8〕 参见王真真：《董事勤勉义务制度的利益衡量与内涵阐释》，载《财经法学》2022年第3期。

〔9〕 参见梁爽：《美、日公司法上的董事合规、内控义务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外法学》2022年第2期。

〔10〕 参见前引〔7〕，汪青松等文。

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行业规定和自律监管规则之中。^{〔11〕}此外，不仅在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国资管理部门也在探索合规义务的构建，^{〔12〕}中央结合地方的董事合规义务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从公司类型看，立法者对董事合规义务的探索试点主要限于在境外从事经营业务的中国企业，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行业的公司等，而并未普及到所有的公司类型。从规范层级看，这些合规规范的法律层级和效力并不高。

其二，董事合规义务的内容呈现共识与分歧交错的特点。关涉公司合规的部门规章与行业规定大多采用列举的立法技术，专条规定董事会的合规管理职责，并明确董事会对公司的合规管理承担最终责任。具体而言，董事的合规职能主要包括六类：一是批准类义务，主要批准的事项有合规管理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公司年度合规报告等。二是决定类义务，决定事项主要包括公司合规部门的设置、职能以及人员聘任、薪酬等，董事会还可以研究决定有关合规管理的重大事项，合理配置合规管理工作所需的相关资源。三是评估监督类义务。对这类义务的设置，不同规范的表达并未如上述两类义务的设置那样高度统一，而是呈现出有和无、宽和松的差异。保监会要求对实施情况进行一次性的年度评估，证监会则强调董事会应评估合规管理有效性，督促解决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凸显董事监督的持续性，而国资委的规定并未涉及该项义务。四是处罚类义务。这一点仅仅体现在国资委对中央企业董事会的要求中，即按照权限决定有关违规人员的处理事项，然而，江苏省国资委却将该项权力配置给了公司党委会。^{〔13〕}五是沟通类义务。银保监会与证监会要求董事会建立与合规负责人的直接沟通机制，国资委对此并无涉及。六是兜底类义务。立法者以董事会应当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合规职责”兜底，使董事合规义务内涵具有开放性。由此可见，在多元主体分别推动公司合规的背景下，中央各职能机构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认知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其三，董事合规义务呈现无处安放与无可追责的治理窘境。我国公司合规的推动呈现自上而下的直接插入式与粗糙式的前进样态，这种单一的制度插入使得立法者忽略了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和与既有制度的融合。一方面，立法者均只强调董事会的合规职能与董事的合规义务，却回避了如何将其安置到既有的董事义务体系进而进入司法审查视野这一关键问题。另一方面，立法者仅注重赋权，与职责配套的责任机制竟告阙如。仅有证监会的合规要求中对董事违反合规要求施加了警告、罚款、责令参加培训、认为不适当人员、责令改正等行政监管措施，^{〔14〕}更具打击力和自觉性的民事责任则未见诸规范要求。有学者批评道，这种合规机制“变成了变相审批、私下命令、窗口指导、合作式合规，实际上导致了监管机关的不当扩权，通过‘严格责任’消灭了公司合规”^{〔15〕}。

〔11〕 参见《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42号）第8条、《证券公司合规管理实施指引》（中证协发〔2017〕208号）第2—3条等。

〔12〕 参见《天津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津国资〔2020〕12号）第6条、《广东省省属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粤国资综合〔2020〕8号）第6条等。

〔13〕 参见《省属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苏国资〔2019〕110号）第6、7条。

〔14〕 参见《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令第166号）第32、34、35条。

〔15〕 邓峰：《公司合规的源流及中国的制度局限》，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1期，第44页。

（二）实践层面：我国董事合规义务的自发探索

在司法裁判面向，一则，董事的合规义务更多体现为董事自身的守法义务，即董事的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外部规范，也不违反公司章程等内部规则。法院常常将“合规”与“合法”搭配，“规”的含义往往被狭义解读，体现为以公司章程为代表的其他内部规则。例如，在“锐碳公司与楼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作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持公司的正常经营，应做到合法、合规、勤勉地履行职责，其在个人工资的发放、差旅费的报销上存在违规行为，失信于公司其他股东”^{〔16〕}，故应将已经报销的与公司经营无关的出行花费返还公司。事实上，董事的守法义务恰巧是我国现有合规规范缺失的一点，大约在规范制定者看来，守法义务当然是董事的合规职责之一，无需被特别规定，而司法续造的力量使得合规义务的内涵更为丰富和明确。

二则，合规规范中频繁提及的董事对公司不法行为的监督义务很少被当事人主张，法院也很少提及，仅有个别案件见诸裁判。例如，在“恒久公司与杨某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恒久公司的业务流程管控、财务管理制度，确实存在混乱、不规范的问题，但该问题系公司内部治理问题，不可直接归咎于杨某履职违反勤勉义务。”^{〔17〕}在本案中，法院事实上传达了这样的一种裁判逻辑，监督体系的建构与董事勤勉义务之间欠缺一定的关联性，前者存在瑕疵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董事义务的违反。

三则，对董事的合规要求常与董事的忠实勤勉义务关联。在“汶瑞公司与王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被告王某在担任原告董事长期间，安排并参与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被安丘市国税局处以罚款和滞纳金共计130余万元，原告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被告辩称其“主观上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利益，更没有假借原告为自己谋取半点私利”，但法院并未采纳，而是由此行为直接推论，被告“已明显违反了其作为原告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对公司应当负有的忠实和勤勉义务”，“应当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18〕}。本案中，法院传达出这样的一种裁判逻辑，董事的不合规行为是对忠实勤勉义务的违反，进而将董事的合规义务（主要是指守法的义务）划归到既有的董事义务体系中。这一裁判思路带来的理论困惑是：董事的违法行为并未谋私，而如何落入忠实义务范畴；法院不问行为人过错的裁判逻辑与勤勉义务强调过错的审查标准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的龃龉，以使得合规义务难以落入勤勉义务领域。

在治理实践面向，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的发展呈现主动与被动的双重面向。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已经将董事的合规职责写入公司章程，但并未生成如勤勉和忠实义务一样的“合规义务”之表述。就公司行业看，这些公司大多为相关主管机构已对其合规建设有了明确要求的中央企业、金融企业等，如中信证券、中国建筑。就合规义务内容看，章程所定的董事合规职责与合规文件内容并无太大出入，合规入章很大程度上是照搬例行操作。然而，也有不少企业在我国现有监管规范尚未对其合规机构设置作专门规定的前提下，走在了主动合规的路上。例如，华新水泥、云

〔16〕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6民初6510号民事判决书。

〔17〕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4民终2833号民事判决书。

〔18〕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2014）安商初字第132号民事判决书。

赛智联专门制定了《董事会合规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文件。正如经济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一定程度的主动合规承诺对公司绩效具有促进效应。^{〔19〕}

另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更多体现在勤勉义务之中。作为上市公司章程示范文本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8条明确将“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等体现合规精神的行为类型划归至勤勉义务，万科A、海天味业等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进行了同样设计。

立足我国立法现状、司法裁判与公司治理实践语境，观察我国董事合规义务的本土治理表征，可以发现，虽然“合规义务”的明确表述并未被提出，但是围绕董事合规职责的规范构建已经初具体系，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生根发芽。文本规范传递出的共识是合规义务内容主要包含合规体系的建构义务以及合规有效性的监督义务，而司法实践则更强调董事自身的守法义务面向。然而，合规文本表达的粗糙以及司法实践续造的缓慢都使董事合规义务表现出难以解释的困境：董事合规义务应当如何与既有的勤勉和忠实义务体系兼容，法院又该秉持何种审查标准。自上而下的多元主管机构的并行推进、公司被动合规与主动合规的共同呈现、有限的合规共识与不少的合规分歧，共同构成了我国现有董事合规义务的本土治理特色。

三、董事合规义务的域外演进与比较

合规的舶来属性使我们不能只着眼于本土资源的提炼，更需要我们借助比较法上的有益经验来厘清董事合规义务的演进轨迹与内涵，考查具有差异性和共识性的域外立法与司法判例将为我们拓展制度资源。

（一）美国董事合规义务：监督与守法的双向演进

董事合规义务在美国公司法“首都”特拉华州有其发达史，并在司法判例中有着良好的阐释，围绕公司不法行为的不同主导因素呈现出两条发展脉络：一是董事未主导参与公司不法行为，二是董事主导参与公司不法行为。^{〔20〕}前者在判例发展中由被动单一的监督义务，在与刑事合规融合后，逐渐成长为一项体系义务；后者则生成了守法义务，或者称为遵从义务（duty of obedience）。

一方面，以监督义务约束董事未主导参与的公司违规行为。作为会议机关的董事会在公司规模扩大和分工精细化的驱动下，愈发呈现消极状态，主要功能转变为对下属行为的监督与管控。特拉华州法院的几个标志性判例见证了监督义务内涵不断完善与发展的生长图景。

一则，美国董事监督义务的发展呈现由被动到主动、从单一行为的应对到持续的合规体系的建构之路。在“Graham v. Allis-Chalmers 案”^{〔21〕}中，公司职员因与其他公司进行联合定价的围

〔19〕 参见陈永安、刘汉民等：《合规与公司绩效：促进还是抑制？——基于上市公司合规指数的计量和实证检验》，载《证券市场导报》2020年第10期。

〔20〕 参见邵庆平：《董事受托义务内涵与类型的再思考——从监督义务与守法义务的比较研究出发》，载《台北大学法学论丛》第66期（2008年）。

〔21〕 See Graham v. Allis-Chalmers Manufacturing Co., 188 A.2d 125 (Del. 1963).

标而涉嫌违反反托拉斯法被起诉，随后股东格拉汉姆要求董事对该公司不法行为所造成的公司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董事主导、参与或知悉上述联合定价的不法行为。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说明该公司经销据点和职工数量众多的基础上指出，若无任何使人起疑的事由，则董事没有义务建立并运作一个公司内部的信息报告与监控系统，来侦查本无理由相信存在的不法行为。换言之，董事的监督义务具有被动属性，董事无需主动去发现什么，除非下属行为主动呈现在面前。而在其后的“Caremark案”中，董事的监督义务被注入了更多主动性，该案的判决作为一种持久的公司治理原则和合规要求的动态驱动力，已经成为一种福音。^{〔22〕} 艾伦（Allen）法官从《联邦量刑指南》着手，指出董事监督义务应当包括“（1）尽力确保一个适当的公司内部资讯搜集与报告系统的存在（第一要件）；（2）唯有在董事会持续性地或系统性地怠于监督，例如根本没有尝试确保一个合理的资讯收集与报告系统的存在，才会被认为缺乏善意，也才有责任成立的可能（第二要件）”^{〔23〕}。

二则，美国董事监督义务与善意（good faith）义务紧密相连，呈现出在董事义务体系定位中的徘徊不定。体系建构与持续监督二要件形塑了监督义务的体系性和主动性，并被法院作为董事注意义务的要求。然而，在“Guttman v. Jen-Hsun Huang案”中，法院似乎对监督义务系注意义务一环的见解有所改变：怠于监督而生的赔偿责任系建立在违反善意要求之上。^{〔24〕} 其后，在被视为终结董事义务二分与三分之争的“Stone v. Ritter案”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最终确认善意义务应落入忠实义务的框架之中。^{〔25〕}

三则，美国董事监督义务审查重心呈现从第二要件向第一要件的转变。^{〔26〕} 受经济危机影响，法院逐渐意识到“Caremark案”中的第二要件的局限性，即原告很难辩护和证明。因此，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转而审查第一要件，这促使对董事违反监督义务的追责进入了“新常态”。在“Marchand v. Barnhill案”中，法院支持了原告主张，这是因为被告作为食品公司的董事却从未收到或主动寻求任何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信息，这意味着其没有在公司内部构建一个有效的合规监督和报告制度，包括董事会没有负责监督食品安全的委员会，没有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合规性的讨论流程，没有要求管理层提交食品安全合规报告。^{〔27〕} 在“Hughes v. Hu案”中，法院同样针对第一要件展开审查，该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偶尔开会，工作时间不足，并由管理层自主审查关联交易、聘用和解雇公司审计师，这使得管理层积极逃避董事会层面的监督。据此法院认为，董事会未能建立起监控合理信息的合规制度。^{〔28〕}

四则，在美国董事监督义务审查中存在模糊的第三要件“红旗标准”（red flags）。如果董事

〔22〕 See E. Norman Veasey & Randy J. Holland, *Caremark at the Quarter-Century Watershed: Modern-Day Compliance Realities Frame Corporate Directors' Duty of Good Faith Oversight, Providing New Dynamics for Respecting Chancellor Allen's 1996 Caremark Landmark*, 76 The Business Lawyer 1 (2021).

〔23〕 In re Caremark International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698 A.2d 959 (Del. Ch. 1996).

〔24〕 See Guttman v. Jen-Hsun Huang, 823 A.2d 492 (Del. Ch. 2003).

〔25〕 See Stone v. Ritter, 911 A.2d 362 (Del. 2006).

〔26〕 参见前引〔9〕，梁爽文。

〔27〕 See Marchand v. Barnhill, 212 A.3d 805 (Del. 2019).

〔28〕 See Hughes v. Hu, C. A. No. 2019-0112-JTL (Del. Ch. 2020).

意识到了红旗信号（又译为危险信号），却无动于衷，那么其要为监管失误承担责任。^{〔29〕}这一标准被称为“红旗标准”。在“Clovis Oncology,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案”中，法院认为，在原告未足以说明被告董事彻底地未能为关键的临床试验建立一个监督系统时，其必须很好地证明，董事们选择忽略不合规的危险信号。“红旗”只有在人们面前展示以便细心的观察者能看到时才是有用的。^{〔30〕}在“Lending Club Corp. Derivative Litigation 案”^{〔31〕}中，法院则基于董事对危险信号的充分记录、迅速和果断的回应，驳回了原告诉请。但“面对危险信号，法院小心翼翼地将未能履行对欺诈或犯罪行为的监督义务与监测企业的业务风险区分开来”^{〔32〕}。事实上，如何区分上述两者，什么构成危险信号，这些问题均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通常会导致法院驳回股东对危险信号的指控。^{〔33〕}

另一方面，以守法义务约束董事主导参与的公司违规行为。美国有学者指出，守法义务，即迫使董事遵守法律规范，目的是提高公司社会中的合规性，然而，这一项义务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34〕}董事们并不仅仅因为法律的存在就有道德义务去遵守，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董事们可以且应该违反法律。^{〔35〕}然而，这一以利益为导向的守法义务面临着法院裁判的挑战。在“Roth v. Robertson 案”中，董事为公司利益而同意支付恐吓者 800 万元，以避免恐吓者举报该公司在周日照常营业的违法行为，股东对此要求董事赔偿。法院认为，董事所涉行为系违法，从公共政策的考量看，若不严格要求董事对此负责，法院将会创造一个危险的先例。有鉴于事态的严重，虽然原告股东对被告的违法行为早已知悉，甚至不表示反对，但仍判决董事承担责任。^{〔36〕}上述认知试图在善意义务范围内，嵌入董事服从法律法规的义务，并允许司法审查，用社会利益约束董事行为的外部性，从而使公司合法化。^{〔37〕}

美国司法实践针对公司不合规行为以董事是否主导呈现监督与守法的双向演进之路。事实上，美国法也很少明确提及“合规义务”，但与“合规”相关的论述总是伴随着董事的监督义务：^{〔38〕}合规是一个监督系统，公司应采用该系统来阻止违法行为，并向外部机构保证他们正在采取措施来阻止违法行为。1977 年的《反海外腐败法》、1987 年的《联邦量刑指南》以及 2019 年《公司合规计划评价》均为董事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和合规系统提供了明确指引。与此同时，这种对公司法规遵从性的强调又要求董事承担守法义务，以使自身和全体职工“合规”行事。

（二）美国之外董事合规义务：渐进发展的多样态

英国合规体系的正式引入始于 2010 年通过的《反贿赂法》，其赋予商业组织通过制定预防贿

〔29〕 See *Horman v. Abney*, C. A. No. 12290 – VCS (Del. Ch. 2017).

〔30〕 See *In re Clovis Oncology, Inc. Derivative Litigation*, C. A. No. 2017 – 0222 (Del. 2019).

〔31〕 See *In re Lending Club Corp. Derivative Litigation*, Consolidated C. A. No. 12984 – VCM (Del. Ch. 2019).

〔32〕 *Reiter ex rel. Capital One Fin. Corp. v. Fairbank*, C. A. No. 11693 – CB (Del. Ch. 2016).

〔33〕 See Lisa M. Fairfax, *Managing Expectations: Does the Directors' Duty to Monitor Promise More than It Can Deliver?*, 10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Law Journal 416 (2012).

〔34〕 See Alan R. Palmiter, *Duty of Obedience: The Forgotten Duty*, 55 New York Law School Law Review 457 (2011).

〔35〕 See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Antitrust Suits by Targets of Tender Offers*, 80 Michigan Law Review 1155 (1982).

〔36〕 See *Roth v. Robertson*, 64 Misc. 343 (Sup. Ct. 1909).

〔37〕 See Elizabeth Pollman, *Corporate Oversight and Disobedience*, 72 Vanderbilt Law Review 2013 (2019).

〔38〕 See Paul E. McGreal, *Corporate Compliance Survey*, 73 The Business Lawyer 817 (2018).

赂的“充分程序”来进行无罪抗辩的义务，其中董事要作出积极的反贿赂承诺，参与制定必要的反贿赂程序。^{〔39〕}事实上，公司法很早就有了董事合规义务的影子。根据《英国2006年公司法》的安排，董事忠实义务的六大类型之一且位居首位的即是“在授权范围内行事”，包括依据公司章程行事和只为被授权的目的行事，其中“宪章”的外延比章程广泛得多。^{〔40〕}《英国公司治理准则（2018）》则规定了董事的监督义务：“董事会应监督公司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至少每年对其效力进行审查，并在年度报告中报告审查情况。监督和审查应涵盖所有实质性控制，包括财务、业务和合规控制。”

在德国，“合规”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良好公司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董事合规义务已经生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学术界通常将合规义务理解为，董事有义务遵守所有涉及企业的法律规范，在范围上，“该义务不仅要求董事遵守现有的法律规范，而且更要求其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障企业的行为合乎法律的要求，并且及时识别和防范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41〕}。简而言之，德国法中的合规义务包括守法义务、体系建构义务以及持续监督义务。在以董事合规义务为基点展开的“西门子诉纳伯格案”中，虽然法院对合规义务的法理定位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述，但德国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合规义务的规范基础为《股份法》第91条第2款（董事会建立监督系统的义务）和第93条第1款（董事注意义务），进而将其解读为注意义务（或称“谨慎管理义务”）的具体化。^{〔42〕}

在日本，监督权限（《日本公司法》第362条）是董事会职权的重要一环，在认定董事是否违反监督义务时，法院主要考量董事是否充分地构筑了公司内部监督监视机制，是否使该机制有效地运作，其他董事是否能够认识到违法执行义务行为的存在等。^{〔43〕}随着大公司合规问题的出现，董事监督的对象逐渐从代表董事和执行董事扩展至包含公司职工在内的公司业务整体，以确保公司全员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及章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日本法院同样认为，董事并非仅遵守法令即为已足，尚负有建立得以防范员工违法行为之法令遵循制度的义务，其内涵属于董事注意义务的一环。^{〔44〕}“如果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那么即使董事主张自己不知道具体事实，应该也可以认定其违反监视义务（违反善管注意义务）的责任。”^{〔45〕}韩国虽然没有对董事的合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但法院认可内部管理系统的建立属于董事义务的一种，在一定情形下，董事若建立内部管理系统，则可以视为已履行监视义务。^{〔46〕}与日本类似，这种合规内控体系的建构义务被划归至注意义务之下。^{〔47〕}除此之外，董事的守法义务往往作为忠实义务的修饰词，即董事须遵守

〔39〕 参见前引〔2〕，陈瑞华书，第317-321页。

〔40〕 参见〔英〕保罗·戴维斯等：《现代公司法原理》（第9版），罗培新等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10-511页。

〔41〕 张怀岭：《德国法董事合规义务的司法适用逻辑——基于对“西门子诉纳伯格案”的分析》，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3页。

〔42〕 参见〔德〕托马斯·莱赛尔等：《德国资合公司法》（第6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8页。

〔43〕 参见〔日〕近藤光男：《最新日本公司法》（第7版），梁爽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

〔44〕 参见王志诚：《董事之监督义务——兆丰银行遭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署裁罚1.8亿美元案之省思》，载《月旦法学杂志》第259期（2016年）。

〔45〕 〔日〕山本为三郎：《日本公司法精解》，朱大明等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46〕 参见〔韩〕金建植等：《公司法判例研习——以韩国公司法为视角》，张珍宝等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54页。

〔47〕 参见〔韩〕崔竣：《韩国公司法》（上），王延川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37页。

法令及章程以及股东大会的决议，忠实地履行其职务（《韩国商法》第 382 条、《日本公司法》第 355 条）。

尽管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董事合规义务呈现出多种发展样态，但如果借用美国法中的监督与守法二分的合规义务模型来观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守法义务与监督义务的互动交织中，逐渐丰盈着董事合规义务体系。其中，守法义务更多归入了忠实义务框架，监督义务则表现出更频繁的勤勉义务特性。

四、董事合规义务的本土化制度建构

从比较视角观察，董事合规义务既是一个新鲜事物，又是一个从董事义务产生时起就应当富含其中的旧事物，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公司治理语境，实现董事合规义务与既有董事义务体系的耦合，探明合规义务的内涵与审查标准，是推进回应型和主动性合规建设的基础与密钥。

（一）董事合规义务的混合性质

探查董事合规义务的内容是明确其性质的起点，无论是对我国规范文本的分析，还是观察我国司法续造的集体智慧，抑或是提炼域外合规的共性经验，董事合规义务形塑了以董事为中心的两种具体义务：一是董事主导公司不合规行为而催生的守法义务，二是董事不主导公司不合规行为而生成的监督义务。

董事合规义务的类型之一为守法义务。守法义务立足于董事自身的行为，要求董事不仅遵守公司内部规范设定的权力边界，还应当服从外部法律，避免发生越权行为。如果董事会的行为是根据股东会决议作出的，而股东会决议是非法的，那么，也不能免除董事的责任，仍应当视为对守法义务的违反。^{〔48〕}在普遍强调有效合规管理和体系建构义务的背景下，守法义务经常被忽视，但这却是对董事的最基本要求，促使其在底线要求上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三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三审稿”）第 179 条将董事守法义务从《公司法》第 147 条忠实和勤勉义务中独立出来，以凸显该义务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这也是我国与合规有关的部门规章、行业规定所普遍强调的合规原则，即在“培育全体工作人员合规意识”的基础上，凸显“高层管理人员应率先垂范”。^{〔49〕}

那么，董事守法义务的性质如何？《公司法》第 147 条将守法义务作为忠实和勤勉义务的共同限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一审稿”）第 180 条将其从勤勉义务中剥离，划入忠实义务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和三审稿则将守法义务单设第 179 条，显示出立法者的纠结。事实上，守法义务应当被划归忠实义务之中，原因在于：其一，从行为的可责性上看，董事守法凝聚着公众对公司守法的期待，^{〔50〕}这一点与忠实义务试图避免恶意与谋私具有相似性，本质上均属底线性约束，不问董事主观过错的特点，将其与勤勉义务区分开来。其二，从行为的效果上看，董事违法的成本（包括法律处罚和

〔48〕 参见前引〔42〕，托马斯·莱赛尔等书，第 227 页。

〔49〕 参见《关于加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合规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办发〔2019〕13 号）第 18 条。

〔50〕 参见杨大可：《德国股份法规范中的董事守法义务》，载《法治社会》2022 年第 3 期。

声誉损害)乘以被发现的可能性往往低于预期的违法利润,这是一种可以被预料到的损害,“其性质虽不是利益冲突,但也是直接损害公司利益,归入忠实义务更为合适”^[51]。正如在前述“Guttman v. Jen-Hsun Huang 案”中,法院所言:“一个人不可能通过使公司违反它必须遵守的法律来忠实地作为公司董事。”其三,从比较共识看,守法义务的性质闪耀着治理共性的光辉。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均将守法义务作为忠实义务的一环。虽然在美国,董事故意违法被视为善意义务的一项公认原则,但在“Stone v. Ritter 案”后善意义务也最终被作为忠实义务的子项。

董事合规义务的类型之二为监督义务。这里的监督义务仅仅指向合规监督,着眼于公司经理、职员等主体的违规行为,要求董事应建立有效运行的合规控制机制,防止并及时察觉不法行为的发生,并针对已知悉的正在进行的不法情事及时采取行动。我国虽然没有如日本和韩国一样的代表董事制度,但基于对公司利益的维护,董事监督的对象也应当涵盖其他董事。具体而言,董事监督义务可以类型化为三个子规则:

一是防范义务。董事要针对合规风险采取预防性措施,主要指向其应当根据公司的类型、行业、规模、组织结构、地理位置、潜在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慈善捐赠等影响合规风险的因素,设计一个良好的合规计划,包括具有清晰的导向、完备的组织以及高效的监督问责机制等,并表达公司对违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防范义务致力于解决董事会有无建立合规体系以及如何建立合规体系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专门的合规机构可能并不必要,但广义上的合规体系应当是每个公司所必需的。德国一般认为董事会是否必须在公司内部建立一个合规组织,完全取决于每家公司的风险状况,在那些小型公司中,根本没有必要设立自己的合规组织,只要采取个别措施以履行合规义务就足以。对于第二个问题,各国一般赋予董事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允许其受到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

二是监控义务。这是将设计完备的合规体系从纸面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董事应当确保该项计划的严格执行和有效落实。具体包括:董事应当定期评估合规体系的有效性,保证公司信息的通畅;审议批准公司合规报告,并针对合规报告中反映出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与合规负责人直接沟通等。

三是应对义务。虽然设计良好的合规体系有助于发现问题,但并不会消除这些问题,即便再完美的合规体系也不能阻止所有的违法行为。一方面,当公司出现不合规行为的危险信号或有明显的不法行为迹象时,董事应当及时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一系列的惩罚和补救措施,如解聘负有主要责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举报电话、信件或公告、公众怀疑、消费者投诉、民事诉讼索赔以及合规计划发现的危险信号等都足以提醒董事公司内部可能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合规体系绝非静止不变的既定文本,而是一个需要与时俱进和漏洞填补的动态系统。董事应当持续改进公司的合规计划,从已发生的不法行为中吸取教训,以防再次发生此类不法行为。

董事监督义务的性质如何?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勤勉义务的一环。从监督义务的本质来看,

[51] 王真真:《我国董事监督义务的制度构建:中国问题与美国经验》,载蒋锋、卢文道主编:《证券法苑》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92页。

“防范—监控—应对”无一不是以程序为重要表征，期待董事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尽可能充分地获取资讯，并且于决策时展现出相当的专业与判断力，以面对这些不确定的违规风险因素。因此，监督义务与勤勉义务具有价值理念上的一致性。有美国学者从法经济学视角，将注意义务建模为对道德风险的回应，试图提升对董事来说代价高昂且委托人不容易观察到的努力，而忠实义务则被建模为对逆向选择的反映，委托人寻求真实地披露董事所持有的私人信息。将这一模型运用到公司合规问题中可以发现，董事监督从根本上来讲是诱导努力，而不是承受披露，最佳的司法方法是把监督义务定义为注意义务的子集，而不是忠实义务的子集，但为违反注意义务所提供的通常的法律保护将不再被适用。^[52]从比较法视角观察，董事会承担的风险管理的组织义务以及持续监督的义务被德国、日本和韩国视为勤勉义务的一环。在美国，监督义务进入善意义务的责任体系具有鲜明的工具属性，旨在应对20世纪末、21世纪初安然、世通等公司治理的失败，扭转董事的懒散与冷漠，充分发挥监督功能。^[53]但这一结果导向的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根据特拉华州法院目前对监督义务的评估，这方面的责任比注意义务将更加罕见。^[54]有学者形象地描述道：“善意和监督的结合是让双方都变得更糟的不幸婚姻之一。”^[55]因此，将监督义务划归至旨在强调努力等道德风险的勤勉义务之中最具解释力。

概而言之，董事合规义务应当是一个兼具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双重属性的混合义务类型，其中的守法义务归属忠实义务，而监督义务属勤勉义务的一环，也即合规义务不是与勤勉和忠实义务并列的义务类型，而是被包含与包含关系。事实上，从“合规”与“忠实”“勤勉”的文义上理解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前者是一种更为具化的要求，而后两者更侧重道德层面，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因此，合规并不具有与忠实和勤勉相并列的文字意涵。

（二）董事合规义务入法路径

董事合规义务既然可以被既有的董事义务体系包含，是否意味着《公司法》无需单独强调，而留待司法实践解释与续造？或者保持既有的规范现状，在特殊行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继续探索？着眼当下和未来可以发现对董事合规义务在《公司法》中作特殊安排具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在当下，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的特别安排是公司刑事合规有效落实的内生机制。以减免刑事责任为手段的激励企业自我预防犯罪的刑事合规已经先于公司治理层面的合规融入了司法裁判与治理实践，二者的不同步也使得公司治理合规无法有效反哺和落实刑事合规的成果。在“Caremark案”之前，美国已经开启了对董事监督义务的探索，这也为法官积极续造刑事合规与治理合规的融合提供了司法经验。而我国不仅于司法层面缺少对董事监督义务的司法续造，而且规范层面表现出多部门自说自话的局面。因此，在《公司法》层面有效落实合规要求，可以实现规范文本从杂乱到相对统一的秩序安定，合规企业从重点企业到全部公司的普及，更好地实现与

[52] See William C. Bunting, *A Simple Model of Corporate Fiduciary Dutie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Corporate Compliance*, 17 *Review of Law & Economics* 583 (2021).

[53] See E. Norman Veasey, *Policy and Legal Overview of Best Corporate Governance Principles*, 56 *SMU Law Review* 1066 (2003).

[54] 参见前引[33]，Lisa M. Fairfax文。

[55] 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The Convergence of Good Faith and Oversight*, 55 *UCLA Law Review* 559 (2008).

刑事合规的衔接和企业风险的防控。另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的特别安排是优化公司治理与营商环境的实现机制。中概股的危机以及境外经营企业的受罚风险刺激着我国合规从政策层面走向法律层面，从域外合规走向国内合规，从外部合规走向公司内部自生合规，这是以制度型开放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接轨的必然趋向。

在未来，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的特别安排是数据风险的防范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公司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数据公司在给我们提供更为便利服务的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这些公司的贪婪面相：数据滥用、数据泄露以及数据垄断等数据统治行为愈演愈烈。从公司内部以董事合规义务的自生力量推动企业有效防范、识别和应对可能出现的算法违规风险，是对规范数据运用的公司自省机制。另一方面，董事合规义务的特别安排是人工智能介入公司治理的约束机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参与公司决策和运营已经从设想走入了现实，从协助董事到充当董事顾问，再到替代董事，^{〔56〕}意味着法律需要为可能出现的问题留有空间。而以监督义务和守法义务为核心的合规义务的建立可以锁定智能顾问机器使用的风险，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合规监督，妥当识别机器造成的错漏。

面对提升守法合规规定定位的强烈实践需求，董事合规义务应当如何融入《公司法》？一方面，在总则层面，《公司法》应当如三审稿第 177 条对国家出资企业的合规要求一样，在总则部分单设一条：“公司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董事会会对合规管理的有效性承担责任。”在分则部分，应当将三审稿第 179 条的守法义务再回归至一审稿第 180 条第 1 款之中，将守法义务与忠实义务同款规定，为法官提供明确的审查规则指引。至于监督义务，可以在三审稿 180 条第 2 款中，增加“董事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以保持现有的董事义务结构。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基于降低制度转换成本、维护法律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考虑，可以不先在总则部分引入，只在分则部分列示。另一方面，合规体系的建立需要依照不同类型公司进行精准设置。这是因为合规体系的建立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小型企业董事可以在保证企业信息有效传递的同时，精简设置合规体系。

（三）董事合规义务的判断标准

董事合规义务的判断应当依其内容的性质差异而分别适用不同的标准，在回归忠实和勤勉义务审查路径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守法义务与传统忠实义务的内涵差异性、监督义务所具有的更多不作为属性有别于传统勤勉义务，使合规义务的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1. 守法义务的判断标准

第一，守法义务与忠实义务一样在赔偿责任方面并不以过错为成立要件。这是因为董事的不法行为是对已经公示的饱含公共利益的法律秩序安定性的破坏，其本身就可以推定董事有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929 条第 2 款、《公司法》第 149 条、三审稿第 187 条之规定也从实证法角度验证了这一点。“如果董事违背公司宪章的规定而行事……即便这种违法行为是为了公司利益，或者董事在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其行为违背了公司宪章，也并不相干。”^{〔57〕}

〔56〕 See Akshaya Kamalnath, *The Perennial Quest for Board Independ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the Rescue?*, 83 Albany Law Review 43 (2020).

〔57〕 前引〔40〕，保罗·戴维斯等书，第 516 页。

第二，董事违反守法义务，赔偿范围如何界定？尤其是在董事违法执行业务给公司带来一定利益的情境中，应当如何界定损失？这一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忠实义务的赔偿原则，美国法上确立了“净损失”规则，即原则上，原告公司或股东必须证明被告董事的违法行为与公司或股东所受到的损失或者请求的其他赔偿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但被诉董事可以主张若公司因该不法行为受有利益，在不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允许该收益与被告责任抵销。^{〔58〕}净损失规则在维护某一成文法的精神或者其他明确的公共政策的同时，避免公司和股东双重得利以及投机取巧，免让董事负担过于严苛的民事责任。同样，德国也强调董事的赔偿应当像公司根本没有进行那种违反义务的行为一样。这种估算差额、利益相抵原则可资我国镜鉴。

第三，法官在认定董事不法行为的损害范围时，应当将公司名誉损害划定其中。这是因为董事违反守法义务“更可能对公司之名誉造成重大损害，若不能将此一名誉损害之考量有效地纳入董事于行为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之中，将使董事错估公司不法行为所会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而无法有效抑制公司不法行为的产生”^{〔59〕}。在前述“Hughes v. Hu 案”中，特拉华州衡平法院认为，虽然公司的净收益没有因董事失职而遭受损失，但公司为修正信息披露支出的费用、应对诉讼的费用，特别是公司遭受的严重名誉损失都是董事失职给公司带来的损害。

2. 监督义务的判断标准

特拉华州一系列的判例事实上传达出一套十分有益的审查董事违反监督义务的模式，即是否建立了一个合规体系，是否监督了已建立的合规体系以保证其有效运行，是否对危险信号作出了反应，对于我国同样可以从这三个方面逐一校验。

第一，对第一要件的审查可以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是否建置合规体系的问题。在合规要求普遍化的背景下，该问题并不属于董事会商业判断的范畴。若董事未建置和运作相应的合规体系，则属怠于监督。正如在前述“Stone v. Ritter 案”中法院所认为的，董事会有意识地决定合规计划的成本大于收益而不再实施合规计划的决定可能不再受商业判断规则的保护而导致赔偿责任的产生。二是如何建置合规系统的问题。合规计划的性质、范围和内容需要董事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专业判断和实质分析，因此，诸如公司合规负责人的选任与解聘、薪酬、评价机制，公司合规委员会的设置，公司合规管理时投入的人力资本的数量等事项，均是受商业判断规则保护而免受司法审查的，^{〔60〕}法院应当将董事之决策置于优位，而法院自我拘束介入。

第二，对于第二要件争议最大的问题是，既然监督义务为勤勉义务的一环，那么，其可否适用商业判断规则。一般而言，“商业判断”有两层含义：一是判断中应当体现董事的能力和经验；二是这是一个决定，可以是做某事的最终决定，也可以是有意识地决定克制自己的行为。^{〔61〕}然而，在仅仅是疏忽监督的语境，董事们在应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做，其中既无涉能力，也无涉对外决定的表征，而且，法院也没有决策过程可以评估，因为董事根本没有决策。因此，商业判断规则原则上不适用于这一情形。此时，就要求法院介入审查董事的监督行为。特拉

〔58〕 参见〔美〕美国法律研究院：《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楼建波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05页。

〔59〕 前引〔20〕，邵庆平文，第29页。

〔60〕 See Stephen M. Bainbridge, *Caremark and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34 Journal of Corporation Law 967 (2009).

〔61〕 See Andrew Keay & Joan Loughrey, *The Concept of Business Judgment*, 39 Legal Studies 36 (2019).

华州法院对董事违反监督义务的判断是基于董事持续性或系统性地怠于监督，且原告必须证明被告董事明知或应当知道。这一标准事实上十分宽松，“这可能是公司法中原告希望赢得判决最为困难的理论”^{〔62〕}。在我国市场声誉机制等外部约束机制不强的环境中，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由于这种持续性的监督多为经营风险较少的规定动作，如董事不无故缺席董事会，与合规负责人直接沟通，督促解决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合规体系的有效运行，只需要董事按照法律要求逐一进行即可。因此，我国对第二要件的审查标准应当采一般过失标准。这也可以为董事履行监督义务提供具体指引，董事必须在董事会会议议程和会议记录中仔细地记录其积极参与监督的情况，以确保他们对公司业务的足够理解，尤其是关键业务，例如，在会议上提出试探性问题，并在适当情况下向管理层提出质疑。

第三，红旗信号可以为法院判断董事是否违反监督义务提供新的思路，特别是可以方便法院对第二要件的审查。如果相关事实显示出公司内部不合规的危险信号，或者董事会知悉不法情事正在进行，此时董事未能作出回应，则会违反监督义务。那么，法院应当如何判断红旗信号？对此，法院应当综合考量该不合规行为对公司潜在损害的大小、董事作出反应的时间、危险信号的来源、信号的发生频率以及信息的可用性等因素来判断董事在面对危险信号时是否有意识地忽视了其职责。^{〔63〕}同时，还应当关注企业的关键使命，如食品公司对食品安全、药品公司对药品安全，此时，董事的监督责任应更为严格。

仅有董事违反合规监督义务，是否必然引发责任？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董事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还应当具有因果关系。但监督责任属于典型的不作为责任，在这类案件中，原告一般都很难证明因果关系，因为很难说董事如果尽到了监督义务，就一定可以阻止坏事的发生。在德国，如果公司已经能够补充证明在过失行为和损害之间有可能存在着因果关系，那么，董事的举证责任就不仅涉及狭义的过失，而且涉及具有客观性的违反义务的行为和因果关系。^{〔64〕}美国法院虽然普遍认为原告应当证明因果关系，但在“Cede & Co. v. Technicolor 案”^{〔65〕}中，特拉华州最高法院也确立了一种举证责任转换规则，即先由原告证明被告违反了注意义务，如果原告举证成功，则举证责任转给被告，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来讲，对公司是公平的，从而免除了被告证明因果关系的任务。^{〔66〕}为避免难以追究董事监督责任的情形发生，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思路。如果回到法官视角，则在认定因果关系时可以综合考虑损害是否具有可预见性（董事对于不法行为存在的可能性情形是否“已知、应知、可知”）、损害是否具有可回避性（董事是否能够回避、防止通常情况下的损害发生），以确立相当因果关系。^{〔67〕}

〔62〕 Stone v. Ritter, 911 A. 2d 362 (Del. 2006).

〔63〕 See Anne Tucker Nees, *Who's the Boss? Unmasking Oversight Liability within the Corporate Power Puzzle*, 35 Delaware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 199 (2010).

〔64〕 参见前引〔42〕，托马斯·莱赛尔等书，第227页。

〔65〕 See Cede & Co. v. Technicolor (Technicolor II), 634 A. 2d 345 (Del. 1993).

〔66〕 参见〔美〕里查德·D. 弗里尔：《美国公司法》（第7版），崔焕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43页。

〔67〕 参见前引〔9〕，梁爽文。

五、结 语

如今，公司合规已经成为一场不可逆转的公司治理革命。如果说刑事合规激励是公司合规的外部推手，那么，董事合规义务的塑造则是公司合规自生自省自律的力量，更具持续性和坚韧性。合规义务的重要意义绝非意味着其只有脱离既有的董事忠实和勤勉义务二分体系，另立门户，才能实现更自由的逻辑演绎，而只是说其具有被单独强调的现实意义和逻辑支撑。然而，合规风险仅是企业众多风险的典型而非全部，董事合规义务的建置也非公司合规治理的全部。如何与既有的公司监督力量协调？专业的合规官应该如何设置？不同风险指数的公司又该如何区别设置合规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公司治理合规语境不断思考与探索。当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合规时代时，“既有制度的约束条件不过是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而已”〔68〕。

Abstract: Corporate compliance is a new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the shaping of directors' compliance obligations. On the normative level, although the explicit expression of directors' compliance obligation has not been put forward, the normative construction of directors' compliance responsibility has begun to be concrete, and it presents a governance dilemma with different contents, nowhere to be placed and no accountability. On the practical level, directors' compliance obligation has taken roo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practice, which is related to loyalty and diligence obligations, but more reflected in directors' own law-abiding obligations. The divergence of theoretical views, the ambiguity of legislative practice and the lack of judicial continuation have aff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pliance system from policy promotion to self-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isting dichotomy system of directors' obligations. Compliance obligation consists of law-abiding obligation and supervision obligation. The former belongs to loyalty obligation and the latter belongs to diligence obligation, and different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are applied respectively. Facing the strong practical need to improve the orientation of law-abiding and compliance, the compliance obligation of directors should be raised from the invisible expression of departmental rules to the explicit listing of the Company Law.

Key Words: corporate compliance, directors' obligations, supervision obligation, law-abiding obligation

(责任编辑：周 游 赵建蕊)

〔68〕 前引〔15〕，邓峰文，第45页。